

班班多杰 著

藏传佛教思想史纲

撰写一部佛教史或哲学史，其叙事方式是至关重要的。表面上看，叙事方式是形式，实际上它已经与内容水乳交融、不可二分，有什么样的叙事方式便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成果，此即谓“形式即内容”也。

班班多杰

 人民出版社

藏传佛教思想史纲

班班多杰 著

责任编辑:段海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传佛教思想史纲/班班多杰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01-016152-5

I. ①藏… II. ①班… III. ①喇嘛宗-佛教史 IV. ①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6384 号

藏传佛教思想史纲

ZANGCHUAN FOJIAO SIXIANG SHIGANG

班班多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0.5

字数:365 千字

ISBN 978-7-01-016152-5 定价:7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985 工程”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宗教学文库（甲种）第四册

主 编 刘成有

学术委员会 方立天 金宜久 龚学增 张志刚
金 泽 张 践 刘成有

编辑委员会 宝贵贞 陈亚明 段海宝 方国根
宫玉宽 刘成有 李之美 孙悟湖
谢爱华 杨桂萍 游 斌

总 序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哲学宗教学文库”（甲种12册），是本校哲学与宗教学学院11位教学科研人员的一点儿奉献。任教于我校哈萨克语系的耿世民先生，因在西域宗教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其文集也一并收入本文库。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不是很大，目前只有20位专职教师；这个院（系）成立的时间也不长，1986年独立建系，2008年更名为学院。但在吕大吉、牟钟鉴、佟德富等前辈的组建和带领下，经过二十多年的砥砺磋商，如今已经成长为中央民族大学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教学科研团队。他们秉承“进德修业”的古训，广泛吸收国内外各高校新生力量，逐渐形成了生活上随缘任运、学术上追求卓越的优良学风。此次集中出版的这批研究成果，有7种是初版，5种是再版。有些是前辈大家早年出版的重要作品，比如牟钟鉴先生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班班多杰先生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赵士林先生的《心学与美学》等，出版多年，图书市场上早已难觅踪影；有些是前辈多年研究的重要成果，比如著名的世界突厥语专家耿世民先生的《西域宗教研究》，虽然是一个文集，但主题十分集中，

学术价值极高。其他 8 种，大多是在他们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而成的，既有对传统哲学问题的深入研究，也有对当代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现在汇编、出版这套文库的目的，主要是借此积累学术成果，表达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家园“感恩的心”。

我们这个群体，不自觉地遇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近现代的中国，置身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表现为“剧烈的社会转型”。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进一步加快，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联袂上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难以回避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当前，如何完整、准确地表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的纠结中，能不能找到真正的“中国价值观”的标签，在推进社会保障与婚姻立法、家庭伦理建设的过程中，面对家庭本位与个体本位的艰难抉择，社会改革的“顶层设计”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剧烈的社会变革，无疑是激发思想原创的最直接动力。广泛而深刻变革的社会舞台，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可以充分施展身手的广阔天地。生活在这样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无疑是幸运的！理论工作者未必能够完全承担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但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本来就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我们这个群体，非常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温馨的大家庭里！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之所以说她“伟大”，除了勤劳勇敢、自尊自信之外，开放、包容，更能彰显出她的美德。“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共同构成了一个温馨和谐的多民族共存共荣的大家庭。中央民族大学得天独厚，是国内极少的 56 个民族聚集最

为齐全的单位之一。在这里，无论是节日饮食，还是宗教信仰，都呈现出“多元通和”的良好氛围。民族、宗教方面的研究，也一直是这个国家级民族教育机构、“985 工程”院校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的核心任务，它也始终扮演着民族、宗教等方面国家级智库的重要职能。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与现实，构成了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宗教学研究的基本对象；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也奠定了新时期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宗教学研究的基本方向。新校训“美美与共，知行合一”，准确、深刻地概括出了中央民族大学独特的精神风貌和办学理念。

实际上，中央民族大学高度关注民族、宗教、哲学问题的“文脉”，完全可以向前溯源到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延安民族学院，乃至蒙藏学校教学和研究的重点。诞生于 1913 年的蒙藏学堂（不久即更名为蒙藏学校），初办时只有中学班，后来又增设专科。增设了专科以后，说明蒙藏学校就具有了大学的性质。在历史上，蒙藏学校不仅培养了一批民族革命干部，而且也造就了一部分了解民族宗教问题的知识精英。乌兰夫、奎璧、多松年、朱实夫、佛鼎等，都出自蒙藏学校。1941 年，由于边区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独立的延安民族学院，当时担任教学和研究任务的人员有孔飞、克力更、牙含章、马寅、高鲁峰（董英）、关起义（刘元复）、海明等人。当时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等，都是极有代表性的研究民族宗教问题的力作。在蒙藏学校和延安民族学院的基础上，1951 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才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深知，学术需要创新，而学术创新的不断累积，才能使学

术变得更加厚重，更加具有历史的穿透力！“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哲学宗教学文库”（甲种12册）的出版，既体现着我们每个研究个体“进德修业”的具体内容，也寄托着我们这个学术团队对中央民族大学“晖光日增”的美好愿望。希望这套文库的出版，能够对新时期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发挥一点儿积极的作用。

刘成有

2012年11月于中央民族大学

再版序言

一

本书是旧作，初版于1992年，此次再版增补了一些核心资料，改正了发现的错字及一些不适当的提法，本想借此重印之际，从表述、史料、理论等方面作一次较大的修订，但几位知心的朋友劝我放弃此想法。他们说，与其花大力气修改此旧作，还不如重起炉灶，写一部反映我目前研究水准的藏传佛教思想全史。并说，这个机缘已经到了，再也不能犹豫、拖延了！多年以前，我就有写作多卷本藏传佛教思想史的奢望，并列出了较为详细的写作提纲，但一下笔，还是觉得在文字表达、资料积累、理论准备等方面都欠火候、不如意，甚至到了写不下去的地步。面对这种状况，我干脆就不硬写了，搁下笔，重新在史料、理念、表述等方面检索、梳理、反思，有一种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劲头，并且读了一些大师级学者撰写的同一类型的经典名著，看他们是如何撰写属思想史类型的学术

著作。后来，当我翻阅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时，他对黄宗羲及其《明儒学案》的一段评论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他结合黄宗羲的这部伟大著作，阐述了撰写学术史著作的四个必要条件：

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得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不可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的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学案》，总算具备这四个条件。^①

梁启超先生的这一总结对我启发很大，用这四个标准来衡量这本旧作，则相去甚远，差距极大，可谓是不在同一个频道上。但我仍然敝帚自珍，十分看重这部幼嫩的旧作。当时，我步入学坛不久，之所以初生牛犊不怕虎，敢碰这样的大题目、硬骨头，是建基于三个条件。首先，得益于我的学术背景是哲学，对哲学基本原理比较熟悉，对中外哲学史略知梗概。因此，从思维方法上为驾驭这样的重大题目提供了理论支持。其次，我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汉藏语言文字，能直接阅读汉藏佛教文献，尽管阅读中遇到很多困难和障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得遇东嘎·洛桑赤列教授。1978年初，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文教研室从西藏调来了著名藏学家、藏传佛教专家东嘎·洛桑赤列先生，从此他成为我校藏学教学和科研的领军人物。他从1978年初至1985年夏给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文专业的研究生、古藏文研究班、本科生以及中青年教师开设了“藏传佛教宗派源流”、“藏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出版2014年版，第63页。

族文化”、“藏族史”等重要课程，这些课程我基本上都完整地听过一遍。其中的“宗派源流”课，我跟从不同的班次听了三遍，其教材是《土观宗派源流》，当时此书的刘立千汉译本虽未正式出版，但以内部翻印的形式流传于世。另外，法尊法师的名著《西藏民族政教史》中的大部分内容似亦源自《土观宗派源流》一书。我当时听这门课作了诸多案头工作，首先，听讲以前先对照藏汉两种文本预习一遍，并参看法尊法师的《西藏民族政教史》以及他的其他相关论文和译著，记下重点、难点、疑点。上课时带着这些问题，专心听讲，认真记录，听课时没听懂或未能记下来的内容，课后随即向老师请教，有时不忍打搅老师，就请教佛学基础好的同学，如当时古藏文研究班的昂旺同学。昂旺是一位活佛，新中国成立前在拉萨色拉寺修学佛法多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他还俗当了西南民族学院藏语文专业的老师，20世纪80年代初，他也成了中央民院古藏文研究班的一名学生。我们一同听东嘎老师的课，在整个听课的过程中，我随时向他请教一系列的疑难问题，并一一得到了较为满意的回答。总之，他对我的帮助很大。听东嘎老师的课，不仅接受了知识，而且搔及痒处，根起慧思，尽心知性。1983年寒假后，是东嘎老师最后一次为藏文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讲授“宗派源流”课。机不可失，我下定决心必须要全程听完这次课，哪怕是半次课都不能耽误。当时我和一位在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文教研室进修的西藏民族学院的老师共同商议，每次课都用砖块式的录音机将东嘎老师的讲课内容全部录下来，课后再将各自的课堂笔记和录音相对照进行补充修订。这样对东嘎老师的讲课内容就有一个完整、准确的理解，勤苦坚持了一个学期后，我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最后我将此听课笔记与《土观宗派源流》的相关章节结合起来反复比较研读，并参考了诸多藏传佛教各宗派的藏汉文资

料以及相关学术论著。这样，我即对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基本框架、主要内容、不同特点、理论渊源，有了一个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我写成系列藏传佛教诸宗派的学术论文，有些论文还请方立天先生给予了指导，他看后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有了这样的基础，我才斗胆去碰这样的大课题。当时就以这本土观·罗桑却吉尼玛的《土观宗派源流》为基本的资料、概念、框架依据，并参考相关文献，经过五年多的努力，写成了这本《藏传佛教思想史纲》。对此，我总结说：“从学东师，栽培深厚，精究土书，理史兼容，涵泳其间，终身受用。”此书于1992年4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由方立天先生推荐，参加了1993年度国家民委社会科学成果评选，获得了优秀成果一等奖。同时，著名藏传佛教专家李冀诚先生撰写的书评，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由著名藏学家黄颢先生、诺布旺丹先生发表的书评在《光明日报》发表，高度评介了此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此著出版距今快25年了，期间国内外的藏学发展日新月异，回头再看这本书，存在的问题、毛病、瑕疵不少，特别是史料主要源自《土观宗派源流》。《土观宗派源流》格鲁派的高僧写成的，其书中大部分资料都源自藏传佛教各宗派开宗明义的经典文本，是藏传佛教通史性著作的典范，在当今藏传佛教研究领域发挥着百科全书式的功效，但凡国人研究藏传佛教史的论著，几乎没有不从其中引经据典的，如法尊法师的《西藏民族政教史》、王森先生的《藏传佛教发展史略》等。但此书作者毕竟是藏传佛教一大宗派的领袖，他在引用藏传佛教各宗派史料的基础上，撰写各派之教义思想史时，难免有自己宗派的门户之见。拙著再引用这样的史料和观点来撰写藏传佛教各宗派的思想教义，则必然

会带上前见、偏见，甚至流俗之见，这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禁忌，我当时便犯了这个忌。为了减少这个不足，趁这次再版之际，我尽可能地增补了一些各宗派自己的第一手资料。尽管如此，其缺憾在所难免。这些缺陷只能在下次重新写作时再从根本上克服吧！这样我又想到了如何重新写作一本能充分反映我当前水准的藏传佛教思想史。

二

若目前再撰写《藏传佛教思想史》，理应达到梁启超先生提出的这四个条件的要求，才对得起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史之本来面目。更何况现在做学问各方面的条件，都比黄宗羲时代要优越得多。必须要能顶得住浮躁之风气，名利之诱惑，耐得住寂寞，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全力以赴，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心无旁骛，方有可能获得较为满意的成果。梁启超先生依据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总结了这四条学术标准后，接着又引了他在《明儒学案》卷首中的两段话：

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梁启超接着说，他这书以阳明学派为中坚。因为当时时代精神焦点所在，应该如此。但他对于阳明以外各学派，各还他相当位置，并不抹杀，正合第一条。他又说：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

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①

在这段引文后梁启超说，我们读《明儒学案》，每读完一案，便觉这个人的面目活现纸上。梨洲自己说“皆从各人全集纂要钩远”。可见他用功甚苦。但我们所尤佩服者，在他有眼光能纂钩得出，这是合第二条件。梨洲之前，有位周海门曾著《圣学宗传》一书，他的范围形式都和《明儒学案》差不多。梨洲批评他道：“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梨洲这部书，虽有许多地方自下批评，但他仅在批评里头表示梨洲自己意见，至于正文的叙述却极忠实，从不肯拿别人的话作自己注脚。这是合第三个条件。他在每案之前，各做一篇极翔实的小传，把这个人的时代、经历、师友渊源详细说明，令读者能把这个人的性格捉摸到手。这是合第四个条件。所以《明儒学案》这部书，我认为是极有价值的创作，将来做哲学史、科学史、文学史的人，对于他的组织虽有许多应改良之处，对于他的方法和精神，是永远应采用的。^②梁启超以黄宗羲及其他的学术著作作为个案总结的这四条学术标准，用现在的话语讲：第一，要整体呈现一个时代的学术面向，且不可以自己的好恶爱憎作为取舍标准；第二，要勾勒出各家各派学说的各自特点，使读者对其有明晰的认知；第三，要忠实撰写各家各派理史的本来实相，也就是说本来的历史与写的历史要相一致，要做到观察的客观性，切忌想当然，主观武断下结论；第四，要把每个人的经历置入整个时代境遇下去考察，惟其如此，始可认知此人的整体人格。梁启超先生列出的这四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出版 2014 年版，第 64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出版 2014 年版，第 64 页。

条学术标准，乍看不那么复杂，很多人写书也就是那么个写法，但真正做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扎实的学术功力，没有透辟的理论洞察力，没有持久的钻研劲头是难以实现的。

三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册自序中说：“哲学史是‘哲学’的历史，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历史。哲学史的对象是‘哲学’，不是人，罗列人名不能算是哲学史，只能算是人名录，点鬼簿。哲学的发展总要围绕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哲学史必须说明这些问题。不能仅只对于某些哲学家的著作解释词句，咬文嚼字，那只能作出一种资料汇编，不是哲学史。书不以人为纲，以时代思潮为纲；以说明时代思潮为主，不以罗列人名为贵。每一个时代思潮都有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哲学史以讲清楚这个问题为要，不以堆积资料为高。”

冯先生以这样的撰写思路，在《中国哲学新编》全书中讲了七个时代思潮：“先秦诸子（分前后期）、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分前后期）、近代变法、现代革命。这是客观的中国哲学史的七个中心环节，也是客观的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自然格局。所谓自然格局就是说，这不是从别的地方搬过来、硬套上去的。一个时代思潮的哲学中心问题讲清楚了，这个时代思潮的来龙去脉也就清楚了。现在我多希望能够比较完全做到的，是在哲学问题上比较完全地说明了一个时代思潮的来龙去脉。能多少做到这一点，就觉得所写的哲学史简明得多了。这样的体裁对于所写的哲

学史有提纲挈领、提要钩玄的作用。”^① 据此，冯先生的意思很明显：写哲学史就要写每个时代的不同思潮，正可谓“思潮是个纲，纲举目张”也。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篇的自序中说：“我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在三十年代发表以后，我总觉得其中的玄学和佛学部分比较弱，篇幅不够长，材料不够多，分析不够深。……在《新篇》的这一册中，我改写了玄学和佛学部分。经过改写的章节与两卷本的有关内容比较起来，材料没有加多，篇幅没有加长，但是分析加深了。其所以能够如此，因为我抓住了玄学和佛学的主题，顺着它们的主题，说明它们发展的线索。玄学的主题，是有、无的关系。我以《老子》第一章帛书本的读法为根据，认为有、无是‘异名同谓’，分析下去，说明玄学发展的三个阶段，这就‘要言不繁’，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在佛学部分，关于佛教和佛学的材料，真是浩如烟海。如果抓不住其中的主题，那就要沉没于海中，不能自拔。我发现，佛学和佛教各派别的斗争，从哲学上看，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斗争，这就是它们的主题。以此为线索，说明了中国佛学发展的三个阶段。这样的说明既合乎中外哲学史中唯心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合乎隋唐佛学各派别在当时发展的具体情况。因此，也就‘要言不繁’，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② 以上冯先生谈到了在他的成名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关于道教和佛教部分是一个薄弱环节。冯先生这里自觉反省他这本书的不足之处，这是难能可贵的。如果对旧作没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准确的把握，就不会在后来《新编》中对玄学和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314页。